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之二十六



来华西方人与晚清厦门社会

李颖 著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二十六

来华西方人与晚清厦门社会

李颖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华西方人与晚清厦门社会/李颖著.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12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ISBN 978-7-5615-4164-7

I. ①来… II. ①李…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厦门市-清代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7765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240 1/32 印张:11.25 插页:2

字数:320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3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时下作序者，或为师长，以示栽培鼓励之情；或为业内专家，以表惺惺相惜之意。李颖于2003年即已获得博士学位，我于五年后始才跌跌撞撞进入博士学习的生涯，自然谈不上师长。对中外关系史研究，也基本是一窍不通，更不敢高攀业内专家的盛名。然而，无论是对李颖博士，还是这本书，我都有些话想说。于是便毛遂自荐，发扬一贯好为人师的作风，恳求作者惠准为其大作絮叨一番。

1988年9月，当时我在县城一中读初二，一天，班内来了一个插班生，我自然对她一无所知。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两人竟然成了同桌。此后我们接触逐渐增多，但也仅仅限于同学之间的普通接触，诸如借个铅笔、橡皮之类的事情。共用一张书桌、同坐一条凳子，矛盾自然难免，一条“三八线”适时出现在课桌的中间，谁都丝毫不能逾越。至于对违规者如何处罚，倒是记不太清了。那时的作者，“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身边如此翩翩美女，以我一个小学毕业前都没有到过县城的农村孩子的目光观之，自然须仰视才见。20世纪80年代，风气初开，男女同学之间接触还比较难为情，全然没有今天彼此间水乳交融的亲密。作者学习比较好（附带说一句，作者一直学习比较好），为多获得一些接触和讲话的机会，我经常以请教问题为由搭讪，自然“三八线”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可惜好景不长，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多久我们便由近在咫尺的同桌被硬生生拆为普通的同学，弄得我连请教问题的借口都不好找。有此一段共同的经历，我与作者虽然说不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也勉强可称“少即相识”了。

1990年,我第一次中考失利,作者顺利由初中升入高中。自此我们形同路人,绝无沟通。1993年,作者进入聊城大学历史系学习。次年,我也阴差阳错万般无奈地进入该校该系读书。在第一次老乡聚会上,我再次见到了已经相当陌生的老熟人。他乡遇故知,自然惊喜异常。人生就是如此偶然,在我一次次懊恼进入如此不入流的学校之时,没有想到却与当年的故人重逢。老乡、老同学、系友,一时间我们的关系陡然变得亲切。每次见面言谈甚欢,还不时回忆同学少年的往昔趣事,好不快哉!在大学,我一如当年一样谦虚,常常找一些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前往请教,或者谎称自己的收音机坏掉去借她的拿来听听。我利用担任老乡会会长的职务之便,经常组织老乡会,一方面显示自己有浓厚的乡情和出色的领导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假公济私,多多与作者在一起。我想本人应该是组织活动最多的老乡会会长,当年的很多同乡,曾经为我的热情和乡情感动,殊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真是愧对乡党们的信任和抬爱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对李颖有了好感。作者当年风华正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颇为招人喜欢。记得有位伟人说过,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都是不朽的诗人。我也曾经是诗人,将当时流行的一些情歌抄录下来,再经过精心细致地编排和改造,铸就自己的不朽诗篇。为此还专门买了一个硬皮的笔记本摘抄各种情歌和情诗,并郑重其事地在扉页上写下“爱是不能忘记的”七个大字。自己写就的颇富文采的作品,不断通过各种手段传递到李颖手中,最初自然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真可谓“心悦君兮君不应”。据本宿舍一位恋爱经验非常丰富的兄弟讲,追女孩子一定发扬癞皮狗的精神,永不言弃,穷追不舍。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癞皮狗生涯,一直从山东追到福建,直到2003年,我与李颖博士喜结良缘。从1994年再次相逢,我们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他乡遇故知到洞房花烛夜,这也堪称一段佳话。

当年为表忠心,尽管我几乎看不懂英文,却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陪读,在资料室和图书馆日复一日地陪她翻阅各种英文文献,并装出兴趣十足的样子。陪读造成了我们当初都没有料到的一个后果,素无上进心的我竟然对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来真的要妇唱夫随了。必须严正声明的是,李颖博士从未以学位为优势给我制造任何的心理压力和现实压力,完全任由我随着自己的爱好一路前行。近几年来,为了我的梦想,她毅然搁置了自己的学术追求,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重任,这也再次体现了中国女性的谦恭与伟大。

作为最亲密的爱人,这些年我见证了李颖博士的一路艰辛。作者写作此书的全过程我是非常清楚的。仅从家中保存到现在的她当年所做的读书笔记和抄录的卡片,便不难想象作者曾经的付出。对于本书的具体内容,我自然不敢轻易置喙、妄言雌黄。不过,我可以以一个熟知内情者的身份告知读者,作者本人对本书也是不满意的,其中原因较为复杂,不说也罢。

李颖博士在后记中写道:“我唯一不需要感谢的是我的丈夫王尊旺先生,本书从写作到出版他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为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我认为这都是他应该的担当。当然,这也是他的心声。”在我看来,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所谓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只不过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后勤保障工作,这种工作我必须而且乐意一直做下去。

值此李颖博士的大作即将出版之际,我似乎比她更兴奋,遂强烈要求写点东西,聊以为序。

王尊旺

2011年10月13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晚清西方人在厦门的活动	12
一 晚清厦门教务的开展	12
二 晚清西方人在厦门的教育与医疗活动	37
三 晚清西方人在厦门的商业活动	48
四 晚清西方人在厦门兴起的自养运动	57
第二章 来华西方人的中外冲突观	
——以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为中心	69
一 西方人视野中的鸦片战争	69
二 西方人对鸦片贸易的批判	85
三 西方人中外冲突观的统一性	102
第三章 来华西方人与晚清厦门反缠足运动	110
一 西方人对中国缠足的认识	111
二 晚清厦门的反缠足运动	126
三 厦门地方社会的反缠足思潮和实践	141
四 西方人反缠足运动的合理性及缺陷	153
第四章 来华西方人眼中的厦门社会	157
一 地方教育	157
二 祖先崇拜	168
三 风水信仰	182
四 基层社会素描：以民间医生和面子问题为中心	194

第五章 来华西方人著作研究·····	207
一 方言字典类·····	214
二 活动经历类·····	221
三 中国历史类·····	228
四 著作目的·····	237
结 论·····	244
 附录一 厦门城市印象·····	256
附录二 厦门乡村印象·····	277
附录三 福师大图书馆藏有关中国社会西文书目提要·····	292
附录四 《闽省会报》与晚清福建社会·····	320
参考文献·····	345
后 记·····	353

绪 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厦门成为近代五口通商城市之一,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拥有各种背景的西方人陆续进入厦门,他们或者经商、或者传教、或者从事各种政治活动。来华西方人的活动对晚清厦门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众多方家所指出,1949年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范式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转移:文化侵略模式、文化交流模式和现代化模式。学术界关于此类综述性论著已屡见不鲜,笔者不打算再作重复性描述,唯就这三种模式中关涉人物史研究的若干方法和路径略作评述。

在文化侵略模式中,研究者刻意选择了适合其理论的若干材料,将一个个作为个体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刻画成一群明火执仗、青面獠牙的侵略者,即使在论述他们所从事的相关文化活动时,也冠之以其在中国所传播的文化系“以奴化思想为核心的帝国主义文化”的恶名。持此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西方人经商、传教、办医院、办学校等活动,都具有侵略性质,带有侵略目的。它们是伴随西方侵略者的商船和兵船来到中国的,是与鸦片贩卖、枪炮屠杀交织在一起的。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以各种角色出现的西方人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在他们“慈善”、“圣洁”、“修好”的面纱下,掩盖不了其真实面目和侵略本性。在侵略模式下,学术界将中外文化交往史研究的焦点过度关注于近代西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行为。其实,将近代中国发生的各种基督教世界和非基督教社会的冲突称

为“教案”、“反洋教斗争”，这本身已经明显地体现了研究者的价值趋向。既系“反洋教”，很自然作为洋人的传教士被置于历史的反面，他们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司法，任意欺压民众，无端惹是生非，这样一群人和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①

文化侵略模式对于西方人的评价并不完全客观，其罗列的西方人的诸多罪行，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下，我们读来可能倍感振奋和自豪，但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却非常容易蒙蔽我们自己的眼睛。“当我们将一切从西方传入的文化均称之为‘殖民话语’，以对待军事侵略的方式来对待这种文化侵略时，我们就有可能在充满正义感的伦理自慰中重新关上思想的大门。”^②

文化交流模式可以说与文化侵略模式殊途同归，研究者同样选择了适合其理论的材料，与文化侵略模式中所描绘的邪恶的西方人不同，此时的西方人成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中介。研究者枚举了西方人将西方历法、数学、物理、地理、医学、哲学、艺术等等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许多人认为，正是由于西方人文化活动的推动和影响，中国开始建立起最初的近代科学体系，近代新闻出版体系，近代教育体系的雏形，这对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推动封建的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③此时，学界不再将因各种目的来华的西方人作为殖民侵略的一部分，而是更注重其文

① 教案史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为张力等著《中国教案史》，该书长达70多万字，它对自晚明南京教案开始的数十起重大教案的背景、原因、经过和影响等都作了点评，并在其后开列了详细的中国教案年表，为该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客观上讲，该书错误较多，以致于有人将之评价为一部草率成书的煌煌巨著。参见梅川：《一本草率成书的巨著——对〈中国教案史〉一书的意见》，《天风》1988年第9期。

②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③ 文凡：《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撮要》，《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

化中介的作用。研究者指出,西方人不仅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中国,而且许多人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学习与研究,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学术界普遍给予某些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深入研究的西方人比较高的评价。如近代来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在该模式研究中,诸多学者均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在引进西方现代文化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过程中,马礼逊是先驱。他在对近代中国影响重大的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交融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中,理应占有显著的位置”。^①

其实,在做如是论断时,研究者忽视了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无论具有任何学术背景和知识体系的西方人,他首先是西方人,其来到中国的基本目的是谋求自身的利益,尽管有一些“不务正业”的外交官员、商人和传教士走上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的道路,但毕竟是少数,而且即使在西方社会,对他们的这种行为也是争论不休。过分强调其文化沟通和交流的功能,置他们作为西方人的立场于不顾,显系不客观之举。第二,他们所代表的也并非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技术和思想,其先进仅仅是相对于中国而言。正如顾长声所说,19世纪末以前来华的传教士,受过西方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数不多,受过专业训练的更少,即便像傅兰雅那样曾经向中国大量介绍西方科技、文化的传教士也只是英国师范学校毕业,不是什么科学家或什么专家。^②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195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引起社会科学界的普遍关注,学术界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晚清来华西方人的著作开始出现,是有代表性的是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其实,20世纪90年代后期面

① 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兼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关于基督教在华活动的论述》,《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世的关于来华西方人尤其传教士研究的诸多著作,尽管并没有标明以现代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但多多少少都带有现代化的痕迹,其落脚点多数为关注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

现代化模式的基本思路是:首先确立什么是现代化,然后根据确定的标准详细考察西方人在中国的各种活动,进而论证西方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影响。该模式不太注重西方人本身的各种商业、政治和宗教活动,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其所从事的各种事业究竟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何影响。作为国内第一本运用现代化理论对来华传教士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王著系统考察了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变革、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开放思潮、传教士与洋务运动、传教士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尽管王著也指出对传教士应当作出客观的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其影响的双重性源于其身份的二元性。他们既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又是西方殖民势力的一员。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无论做出绝对肯定还是绝对否定的评价无疑都是片面的、极端的”。^①但总体上还是对传教士予以了肯定。

现代化范式的局限性在于:无论以何种身份来华的西方人,在中国从事何种活动,其宗旨都不是推动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只是一些客观结果或影响。在现代化的理论预设下,研究者自然较多地关注西方人活动的积极面,由此对西方人的评价也就难以真正的客观和公正。在现代化模式下,我们自然就要追寻所谓的历史意义。由于对现代化标准认识的不统一,在研究过程中势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鉴定到底西方人的哪些行为是现代化的行为,并不遗余力地向持不同意见者解释说明。同时,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典型代表其现代性的决非这些传教士、商人或者政府官员。何兆武在探讨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时指出,早期来华传教士介绍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页。

给中国的不外乎“远西奇器”与“几何原本”，其基本观点仍属静力学的体系，与近代动力学体系无关，在中国需要近代科学和启蒙思想之际，他们作为正宗神学体系的维护者带来的恰恰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过时的知识体系，因而对中国最需要的近代化事业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① 至于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西方人，罗志田认为，近代“与中国人接触的西方人（以传教士为最多，其次为商人），大部分是西人中不怎么‘现代化’的那一部分”。^② 因此，以现代化理论研究这一特定的群体自然会出现一定的偏差。

对三种研究模式的述评，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不能离开客观历史环境简单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更不能由于各种模式存在的不足而抹杀研究者在各自时代的历史贡献。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总不能完全跳出时代和思想信仰的影响，所以我们万不可用后世的眼光去批评前人。事实上，真正有学术创造力的学者在开创一种研究模式的同时，仍然在不停地思考自身的不足。比如顾长声，其《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先后于1981年、1991年出版两版，论者多认为其并没有超出“文化侵略”模式的范畴，但在顾氏于2004年出版的该书第三版中，许多论断和先前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遗憾的是，第三版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我们无法了解顾先生的思想变迁过程。即使是认为现代化模式对解释传教士在华活动非常有说服力的王立新，也在其后的思考中认识到不足之处，“近年来大陆研究传教史的文章明显减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学者研究兴趣的转移，越来越倾向于在‘中国中心取向’下对中国本土基督教会史的研究，同时也未尝不是因为现代化范式自身的局限性。就其研究范围而言，现代化范式局限于传教士在华的文化和教育活动，在这些领域大陆和海

① 参见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章《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外学者近十年的研究已经相当全面和深入,因此在没有新材料和新理论出现的情况下,这一领域的研究很难有大的突破;而就其理论层面而言,现代化范式所依赖的现代化理论遭到所谓‘后学’(后现代、后殖民和后结构主义)的有力挑战,在西方社会科学界逐渐退居边缘位置”。^①

近年来,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出现多元化趋势。在这一研究进程中,对来华西方人的深入探讨和个案分析依然不可忽视。实际上,晚清以来,所谓西方势力进入中国,最终体现为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历史,我们只有通过具体的人的活动的研究,才能真正明晰千变万化的历史过程。一切历史活动、历史现象、历史事实最终都要通过人来体现,都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离开了人的历史便不能称其为历史。纪传体体裁成为中国古代史书撰写的基本模式并非偶然,正是因为它能够鲜明生动地体现丰富多彩的历史活动,能够使后人通过当时人的具体活动认识时代的历史进程。

在晚清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传教士的独特地位无法取代。美国著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费正清在谈到 19 世纪中西关系史的研究时特别指出:“在 19 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但却是最有意义的人物。”^②自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新教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教派林立。从 17 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国家对外扩张的开展,新教开始向海外传播。此时新教的活动大多是传教士的个体行为,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海外派遣和海外传教。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欧洲国家和美国在新兴力量的推动下,纷纷成立各种海外传教团体,这一时期传教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各个宗派的传教士接受所

① 王立新:《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② S. W. Barnett and J. K.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

属差会的调遣和指派,传教士必须忠实履行差会的指令。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来华传教士有意无意地成为差会的“叛徒”。如德国传教士卫理贤曾自豪地说,他从未成功地劝导任何一个人入教;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其实人们所乐道的是作为新闻人和出版家的林乐知而不是作为传教士的林乐知。

当前对晚清来华西方人的研究,不宜做大而化之的空泛结论,而应当脚踏实地开展具体深入的个案研究和基础性工作。唯有如此,才能尽可能避免以偏概全的弊端。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组织翻译的《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正反映了当前的这一倾向。

本书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概述晚清西方人在厦门的主要活动。鸦片战争后,厦门作为最早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很快便成为西方人活动的中心。他们在厦门地区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医疗、教育等活动,对当时的厦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章以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为中心,讨论来华西方人的中外冲突观。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是近代中英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前者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历史性标志,它不仅意味着满清王朝自此被迫一步步融入走向世界的潮流,而且昭示着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噩梦的起始;后者作为一种主要由英国操纵进行的非法贸易,直接损害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制造了一幕幕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家庭悲剧。同时,它还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来华西方人在此体现了认识上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极力辩护英国人为打开鸦片贸易的大门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又对鸦片贸易本身给予了无情的谴责和批判。这种两面性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第三章论述了晚清来华西方人与厦门社会的反缠足运动。当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看到了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风情都没有的奇特现象。他们瞪大了眼睛,感到匪夷所思。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许多人对缠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反对缠足的斗

争中去。西方社会对中国缠足的理解和斗争,基本上是在宗教学设计的框架内进行,尚没有真正从深层次上触及妇女本身作为个人的内心感知和主观欲望。缠足作为一种流传久远的习性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要有内外两种因素的配合,一是全社会审美观念的更新,当世人皆以小脚为丑而致使缠足者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时,自然不会再追逐以小脚为时尚。二是女性自身情感的转变,仅仅依靠外在的压力而没有女性的觉醒,反缠足运动也不会从根本上取得成功。

第四章以地方教育事业、祖先崇拜、风水、民间医生和面子问题为中心考察了来华西方人眼中的厦门社会。晚清许多来华西方人长期在厦门生活,他们对厦门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即便在他们把中国看成一个保守落后的民族时,并没有妨碍对中国前程的预测。通过西方人对中国民间社会尤其是厦门社会的分析,我们明显感知他们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高高置于中国文化之上,认为中国如果想获得进步,必须全盘抛弃自己的本土文化进而接受西方文化。我们无意贬低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体现的历史特征,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明,以他们的标准来判断中国显然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理的。可以肯定地说,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纠葛绝非西方式的发展所能解决。

第五章讨论了来华西方人有关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各种著作。许多来华西方人在从事各自职业的同时,还撰写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著作。这些著作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即方言字典类、传教经历类、中国历史类和中国社会生活类。在各种记载中,西方人均强调自己是在客观公正地记录中国。仔细品味西方人的有关著作,所谓的“公正记录中国”是不存在的。他们一再强调自己的客观和公正,正是为向读者证明,中国的衰退与失败,不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而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西方人意图通过对中国全面系统的梳理,使人们相信,只有西方式的发展才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唯一模式。其实,就中国近代史而言,西方人普遍故意忽视了一点,究竟是谁制造

了近代中国的灾难,又是谁为谋求在华利益进而分割了中国。

结论部分指出,大批西方人来到厦门,他们在当地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活动的同时,对厦门社会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了解。厦门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综观西方人对于中国社会的观察,不论是外交官、商人还是传教士,中国社会西方化是其主要特征。实际上,他们把近代以来西方的发展模式看成了拯救全世界的普世文明,认为只有西方式发展才能使中国进步。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证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决定了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依靠个别社会改良运动所能解决的。要想真正解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必须让整个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本质性的改变,显然晚清来华西方人设计的种种方案都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给出了准确无误的答案。

本书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西文图书。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为福建协和大学(1915—1951),它作为民国时期中国颇负盛名的大学之一,保存了相当丰富的西文图书资料,尤其是英文图书。根据罗德里克·斯科特(即徐光荣)的研究,1933年,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共有62083个书目,其中中文书目46469个,英文书目15614个。在英文书目中,有41%是科学图书,20%是社科图书,10%划为文学类,另有30%为历史类,还有多于6%的宗教类图书。^①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学者田英杰自愿来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编写了一部福建师范大学所藏西文珍善本图书的目录。

田教授的这本珍善本书目按照旧分法编写,其中包括哲学类(含宗教)、经济类、文学类、地理类(含游记)和历史类,共约2500余册,其中绝大部分是英文,另有少部分法文和其他语种的书目。在整理出的2500余册西文善本书目中,约1000册左右的书目为来华西方人有关中国的论著,其中包括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宗教、历史、中国

^① 罗德里克·斯科特著,陈建明等译:《福建协和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